

VELA
ARGAS

传播 文化 社会译丛

[美]迈克尔·舒德森
刘艺嫻 译
展江 彭桂兵 校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Michael Schudson) 著

传播学名家迈克尔·舒德森的最经典作品

THE POWER OF NEWS

新闻的力量

El Mundo Metropoli
Madrid, Spain
设计总监: Carmelo Caderot; Maria Gonzalez; Rodrigo Sanchez

UNU
METROPOLI
FESTIVAL
SINOR
LA TEMPESTAD
MEASURE
MEASURE
SPEARE
MAQUINA HAMLET
DE HEINER MULLER
TORITO BRIVO DE AITOR MAZO A CIEGAS DE
JESUS CAMPOS ZIGURAT CON TEXTOS DE
MANUEL VICENT LA REY DE LOS AN
ABEL Y GORDON EL REY DE LOS AN
FRANTIC ASSEMBLY MARQUE
DISCEPOLO LA MEDE MAQUINA
METADONES LA MEDE MAQUINA
STRINOBERG LA MEDE MAQUINA
BOCA DE
JUEGA DE
JUEGA DE

THE POWER OF NEWS

新闻的力量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闻的力量/(美)舒德森著;刘艺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10
(传播文化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 The Power of News

ISBN 978-7-5080-6634-9

I. ①新… II. ①舒… ②展… III. ①新闻事业—研究—世界 IV. ①G21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5902 号

THE POWER OF NEWS by Michael Schudson.

Copyright © 1995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5-5158 号

新闻的力量

[美] 迈克尔·舒德森 著

刘艺娉 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开

字 数: 292 千字

印 张: 16.25

定 价: 4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致 谢

这本书收集了自 1982 年到现在已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文章。即使是最早的篇章（第二章和第十章）也非常切合最近的主题和方向。导论部分重新整理和延伸了其他章节的观点，在这里第一次发表。

我非常感谢迈克尔·阿伦森帮助我完成此书，也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局外评论家鼓励我写一份重要的导论，这份导论本身就差不多成为了一本书。我也要感谢赫伯特·甘斯、托德·吉特林、丹尼尔·哈林、迈克尔·詹韦、罗伯特·马诺夫、杰伊·罗森、芭比·泽利泽，他们对导论做出了批评性的阅读。同时，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玛丽·埃伦·吉尔非常精巧的编辑。

CONTENTS | 目录

导论：作为公共知识的新闻 / 1

上部 历史视野下的新闻 / 33

第一章 美国报纸三百年 / 34

第二章 叙事形式政治学 / 49

第三章 发问权威：新闻采访史 / 65

第四章 记者是什么样的人？ / 86

中部 媒体力量的神话学 / 102

第五章 鲑鱼或汉堡包：政治与电视神话学 / 103

第六章 罗纳德·里根人气幻象 / 113

第七章 “水门事件”与新闻界 / 129

下部 公民身份及其不足 / 153

第八章 全国性新闻文化与信息公民 / 154

第九章 过往有过公共领域吗？ / 172

第十章 新闻媒体与民主过程 / 186

注 释 / 203

索 引 / 239

导论：作为公共知识的新闻

[1]设想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在今天很容易理解的世界：政府、企业、院外说客、候选人、教会与社会运动通过家用电脑将信息直接传递给公民。新闻事业瞬间被废弃了。公民们通过电脑网络连接他们需要的任何信息来源。他们同时发布自己的信息和自己的评论；他们轻松地在新闻发布者和新闻接受者之间转换角色。奥杜邦协会^②（the Audubon Society）、三 K 党^③（the Ku Klux Klan）、狱中罪犯、夏令营儿童、养老院里的老人、城市无家可归者和乡间隐士都发送和接受着讯息。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成了我们自己的新闻工作者。

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首先，我料想公民们将倾向于依赖最具合法性的公共官员获取新闻，尤其信任白宫传递给他们新闻。作为最具象征性影响力的个人和最具合法性的权威消息来源，总统在设置全国性议程方面甚至要比如今拥有更大的权力。除了总统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等寥寥几个具有明显和高度合法性的消息来源之外，人们将倾向于依赖这样的地方消息来源：其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可信度可由其本人的可接近性而得到确保。宗教团体成员依靠他们的牧师，年轻的运动员依靠他们的教练，夫妻间则互相依靠。其他的消息来源就太难以评估了。例如，国会议员的意见可能比过去更加不统一，今天赋予国会领导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地位高于新议员的权威将会消失。

[2]到那个时候，即便是那些如今渴望更多公共对话、更多民主话语和公共领域中更多声音的社会批评家们也会有足够多的机会。人们会希望有办法对可获得的无限信息分门别类。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相关的？什么是最有趣的？人们需要有人帮忙来说明与解释事件。能够随心所欲地说出最高法院最近的裁决

* 本书中的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② 美国一个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团体，以鸟类学家约翰·J·奥杜邦命名。

③ 美国白人极端组织，成立于 1865 年。

当然很好，但是我们当中谁能指出其中的重要段落并将它们置于语境中呢？人们需要的不仅是索引者（indexer）与摘文者（abstracter），而且需要解释者、记者与主编。有些人会寻求党派性的（partisan）摘要与分析，另外一些人，在发表他们自己的观点时，比任何一个现存的政党、宗教或者教派都不自信，但是他们却希望寻求独立的评论者，希望寻求那些熟悉政治运作方式却又不会对某个政党负太多责任的人，希望寻求那些非常了解政客，熟知政客，能够分析并且洞察他们的人。

新闻事业在某种程度上将会被重构，将会重新出现专业的新闻团队。以获利为目的的发行人带着强烈的市场动机来组建这个团队。一种不太可能的结果是，美国的政党变得一元化，对新闻提供一致的观点。一旦如此，就可能出现政党新闻事业。如果政府领导层本身并不满足于此，那么政府喉舌将会像它在内战之前一直所做的那样找到自己的位置。虽然我们拥有能让每个人都成为平等的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的技术，但是如果没有专业化的新闻机构，现代世界仍是难以描述的。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人们觉得需要新闻事业？为什么人们渴望听到新闻——不仅仅是闲话，不仅仅是关于他们知晓的人与地方的信息，不仅是关于世界各地神秘事物与奇迹的纪录，不仅是实用性的建议与有用的提醒，而且还包括合成的、共享的、有序的并经过编辑的产品？新闻事业在现代文化中位于何处？什么使新闻成为现代公众意识如此重要的因素？

要理解新闻事业作为当代文化的一部分，就要求我们明白，它既作为一整套具体的社会机制，又作为一系列历史上兴起的文学实践，是如何运转的。不仅如此，这还要求我们弄清楚这些机制与实践是如何嵌入和适应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不过，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学家们已经忽略了传播这个话题。政治传播研究曾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繁荣一时，近来一些政治学者也恢复了这项研究。然而，尽管媒体接近政客们实践的中心地带，它们却始终处于政府学术研究的边缘。^[3]这个结果令人诧异，我们甚至对一些基本问题都不甚了了。一种自由的新闻界在促进民主方面比另一种更好？依附于政党的媒体与独立的媒体哪一种更好？国家对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的责任是否不可或缺，还是有市场机制就足够了？前者正是欧洲的思想家们所主张的。

[3]我们甚至知道自己想要媒体做什么吗？全面公正地提供信息？揭露丑闻并保护人们远离政治腐败？刺激与活跃公众？即便你或我知道自己的偏好，我们也不清楚哪种新闻事业的制度安排更适合它们。

自然，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学者们以及大街上的男男女女对于新闻媒体都有着大量的建议。民主体制下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也应该成为合格的媒体批评家。但是，大多数批评都是失败的，因为它们误解了现代新闻事业的性质。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媒体制造的新闻是文化的一种形式，那么我们就将更好地理解新闻媒体。我在这里所要建议的与我希望将在接下来的各章中阐明的就是这一点。这表明新闻与意识形态相关，但是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新闻与信息相关，但是并不等同于信息，新闻是一种潜在而间接的社会力量。在这个国家中，产制新闻——在代议制政府和私人新闻采集企业的结构内部的消息来源与新闻工作者之间的交换——是一种战略性的芭蕾舞（strategic ballet），它本身就是政治行动的一种形式。而新闻只是一种文化产品，而非政治行动。但是，新闻与读者或观众的政治行动，与政府官员或其他精英的进一步政治行动有何联系，这经常是不清楚的。新闻是文化的一种形式，我在此称之为“公共知识”。本书探讨的就是美国版本的新闻这一现代的和无所不在的公共知识的社会学和历史学。

作为社会机制和文化形式的新闻

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和媒体专家们带着各种关于一个自由新闻界的忠告打入这些社会。这些人天真地假定，这些社会不应该变成一个像我们自己一样，带着严重瑕疵的媒介体制。地方广播电视上严肃新闻的缺乏，电视网杂志型新闻节目的小报化，全国性电视网新闻部门经费的削减，对不符合专业共识〔记住：《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基本上靠自己追踪“水门事件”^①故事数月之久〕的新闻的抵制——凡此种种也许已经成为至少有点自我贬低（self-deprecation）的理由。²

[4]美国新闻事业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其中有许多可以归结于利益动机。没有人可以天真地假设，媒体被一个自身视野有限的社会部门经营会是自由的。这就对任何寻求将一个资本主义新闻界作为一个自由新闻界的人提出了问题。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午餐时间的阅读也不是免费的。

当然，这种评价仅仅是对美国新闻事业的一种片面解释。主要的左派思想家大多数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一种一知半解的平民主义的（populist）观点坚持认

① 1972年6月17日，有5个人因闯入水门大厦内的民主党全国总部安装窃听器被捕。《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与卡尔·伯恩斯坦经过长期调查，终于揭露出真相，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

为，美国新闻事业处处着眼于资本家的自身利益；《时代》（*Time*）杂志的每一期封面，《60分钟》^①（*60 Minutes*）的每次调查以及《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每个头版都是被设计好用来不遗余力地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每一次突出的辩论或争议都只是为了掩盖更深层次的观点的一致性。

对于诺姆·乔姆斯基^②（Noam Chomsky）和爱德华·赫尔曼^③（Edward Herman）来说，整个问题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纽约时报》就是《真理报》^④（*Pravda*）（与统治阶级的幌子没有多少区别）³。其他的每一件事都能让人们看得更清楚。这种观点是误导人的，有害的。这里值得花一些时间说明原因。首先，《纽约时报》从未想成为后者——无人惋惜的《真理报》。《真理报》的记者明白，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支持苏联共产党解释革命的苏维埃议程。《纽约时报》记者可能的确是爱国者，但是他们将自己的日常任务看成是报道新闻，而非阐明党的路线。他们信仰公正的和客观的报道。他们几乎总是带有强烈的职业伦理观念。而在一种强烈的政治框架内观察当天事件的记者反倒是不常见的。媒体老板屈从于市场需求，或者至少是屈从于他们对市场需要什么的感觉。很明显，他们通过制定预算对新闻报道设定限制。今天他们很少把媒体当做一个肥皂箱^⑤来宣传他们自己的政治观点或他们所倾向的任何政治正统学说——如果他们有任何倾向的话。

其次，美国存在着一个有活力的辩论场。这种争辩是为人们所接受的。主要政党之间的区别构筑了一个合法的争论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当代新闻媒体试图公正地代表双方。既不是乔治·布什^⑥（George Bush）也不是迈克尔·杜卡基斯^⑦（Michael Dukakis）被问到资本主义，既不是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也不是布什被问到经济增长，但是他们之间的分歧是现实的、深远的——比如说，

①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档深度新闻节目，1968年开播，以调查性报道著称。

② 诺姆·乔姆斯基（1928-），美国犹太裔语言学家、左派思想家，与爱德华·赫尔曼合著《制造认同：大众媒介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媒体为少数人服务和破坏公民以民主方式支配生活的能力。

③ 爱德华·赫尔曼（1925-），美国经济学家、媒介分析家，致力于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媒介运作。他出版的最著名的书，就是与乔姆斯基合著的《制造认同：大众媒介的政治经济学》。

④ 原苏联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⑤ 英国和美国早期的政治家，经常站在街头遗弃的肥皂箱上宣讲自己的观点，因此当时的政治被称为“肥皂箱上的民主”。

⑥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1924-），即老布什，美国政治家，1989-1993年担任美国总统，在此之前担任过美国副总统、国会议员、大使等。

⑦ 迈克尔·杜卡基斯（1933-），美国希腊裔政要，1988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曾任马萨诸塞州州长。

对于军队中的同性恋者、女性堕胎、人们要求福利、穷人需要医疗保健、商人争取减税、制造商感觉受到管制这些问题。这些分歧就构成了差异。在我看来，不同意这一观点的人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意识形态盲目性。只有当一个人亲眼看到试图参军的年轻同性恋者，寻找安全合法堕胎的女性，由于“既有情况”（pre-existing conditions）而无法获得医疗保险并被告知他们的请求与希望在更大的计划中不值一提的人时，他才会认真地坚持这种观点。

[5]第三，美国的新闻媒体中存在着多种声音。美国媒体对于可能存在的政治观点的范围缺乏宽屏的（wide-screen）视野。与最自由民主制度之下的媒体相比，美国媒体忽视左派观点的表述。美国政治体系也一向如此。如果竞争经常推动媒体趋向于新闻报道的最小公分母（least common denominator），那么其他一些竞争的压力则会促使新闻机构不错过任何一个热门故事——至少不会在它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注意或“遭到”臭名时错过它。“热门故事”不是取悦当权者所必需的。它可能是“美莱（My Lai）大屠杀”①、Pinto 事件②、原油泄漏、“水门事件”或“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丑闻”③。在西方新闻机构中，美国媒体在挖掘丑闻方面是敢作敢为的。⁴

还有，人口与媒体产业的复杂性意味着美国存在着不同的机构与受众，它们的利益并不一致。《体育画报》④（*Sports Illustrated*）由于其读者中有许多是划船与钓鱼爱好者，因此它较早报道了酸雨。一些在新闻界有重大影响力的人则坚持为大众服务——E. W. 斯克里普斯⑤（E. W. Scripps）、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威廉·伦道夫·赫斯特⑥（William Randolph Hearst），这些媒体显赫人物的报纸都以工人阶级为主要读者，支持工人信任的政策和政治事业。无论他们对于大众的同情是否真诚，支持相对弱势的人群符合他们的利益。

① 1968 年在越南南方的美莱村，由于怀疑村民掩护北越军队，美军开始屠杀平民，连几个月的婴儿也未能幸免，共有数百名越南平民惨遭杀害。

② 1973 年出厂的福特公司 Pinto 轿车。1978 年三名未成年人因乘该款轿车尾部被另一辆车撞击后起火而丧生。福特公司被起诉，此案助长了 1970 年代“水门事件”后公众对美国公司的广泛批评。

③ 里根总统执政时期，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助理奥利弗·诺斯中校（Lt.-Col. Oliver North）无视美国政府禁止售予伊朗美制武器的法令，指使情报机构将新式武器秘密卖给伊朗，以交换伊朗政府释放卡特总统时期被监禁的美国人质。这一事件被媒体揭露后，舆论大哗，认为他的作为与美国立国精神不符。

④ 美国综合性的体育类杂志，隶属于时代华纳公司。

⑤ E. W. 斯克里普斯（1854-1926），美国名报人，曾建立美国第一个报团，被称为“人民的斗士”。

⑥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1863-1951），美国报业大亨，人称“黄色新闻大王”，创办《纽约新闻报》和普利策竞争。

最后，媒体不仅是为了创造利润，并且要保持在读者眼中的公信力。它们也确实这样做了。⁵“一份报纸拥有的最有价值的资产是它的公信力，”《巴尔的摩太阳报》^①（*Baltimore Sun*）的一位主编这样评价，“如果人们认为我们不报道自己卷入其中的事，那么他们将会开始怀疑我们还有其他什么没有报道。”⁶媒体不仅要在大多数人口中，而且要在专家与总是吹毛求疵的亚群体中保持公信力（特别是在华盛顿）。只要这些亚群体中有异议的声音，新闻界就有保持公正的压力。

[6]虽然《纽约时报》不是《真理报》，但是一些左派确实做出了有的放矢的批评，并且击中了它的要害。当然，认为媒体通常是“国家主义的”（statist）和强烈的民族主义的（nationalist）的主张，这是可以被证明的。⁷我们可以认识到，新闻工作者作为局内人而非牛虻（gadflies）所得到的快乐与回报；公司媒体不会让爱德华·R·默罗^②（Edward R. Murrow）、丹尼尔·肖尔^③（Daniel Schorr）、比尔·莫耶斯^④（Bill Moyers）、西德尼·香伯格^⑤（Sydney Schanberg）、比尔·格雷德（Bill Greider）过得很舒坦。媒体更经常是在跟随而非引领。对于传统智慧，媒体更多的是支持而非挑战。⁸处于边缘的观点只能得到很少的报道，这不是因为它们缺少有效性与趣味性，而只是因为他们缺少官方的支持。即便媒体的公司结构本身不决定新闻的内容，但是它却仍然可以把一些新闻和讲述新闻的方式边缘化。这就会使新闻价值观服从于商业价值观。对政治劝说的批评正确地指向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主播丹·拉瑟^⑥（Dan Rather）所谓新闻“娱乐化”

① 创刊于1837年的美国老牌报纸。

② 爱德华·R·默罗（1908-1965），美国广播和电视新闻界名人，曾在伦敦主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部工作，在二战中以从英国发回“这里是伦敦”开头的报道而著称。

③ 丹尼尔·肖尔（1916-2010），美国新闻工作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1976年进行调查揭露美国中情局的海外活动，并因此险些遭遇牢狱之灾。

④ 比尔·莫耶斯（1934-），美国新闻工作者、公共评论员。1970-1980年曾同时供职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公共广播公司（PBS），著有《倾听美国民众的呼声》、《秘密政府》、《神话的力量》等。1970年步入电视业之前，他曾经是一位新闻记者，美国第36届总统林登·约翰逊的新闻秘书。1989至1992年，他制作了《观念世界》系列节目的前两部，由此奠定了他在电视界的地位。1992年1月，在比尔·克林顿就任总统前夕，他曾被邀请作为特别嘉宾对其进行采访。比尔·莫耶斯的主要作品有：《倾听美国民众的呼声》（1971）、《费城报告》（1987）、《秘密政府》（1988）、《神话的力量》（1988）、《思想的世界》（1989）、《思想的世界》之二（1990）。

⑤ 西德尼·香伯格（1934-），美国驻外和战地记者，曾驻柬埔寨采访，批判美国在柬埔寨驻军，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他曾获得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并曾获得美国犹太图书奖。

⑥ 丹·拉瑟（1931-），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主播之一，1981年开始担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主播，2005年因报道风波离开主播岗位。

(Showbizification) 的担忧。⁹一位新闻学者仅以此得出“在所有的媒介体制中，新闻媒体是那些行使政治与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新闻媒体的内容总是反映那些资助者的利益”。这种观点忽略了自由社会下的媒体不同于国营、一党制下的媒体的任何一个重要区别与重要方法。¹⁰

媒体同时面对着优秀的左派和右派的批评者。右派批评者的矛头指向了媒体结构，因为这种结构偏向于反对他们的观点。左派批评者在这一点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优势。但是右派批评者们认为主要的全国性新闻机构中的记者和主编有一种突出的自由派观点。他们认为，这些新闻有一种自由派偏向，因为这些撰稿人和主编是从左翼自由派系中招募来的。如果公司组织是明显地偏向右翼的，那么职业招聘的模式却改变了它的方向，就好像跑到另一条路上去了。那些有影响的媒体分析家们——理查德·尼克松^① (Richard Nixon)、帕特里克·布坎南^② (Patrick Buchanan)、斯皮罗·阿格纽^③ (Spiro Agnew)——在 1969 年证明了这一点。一项由罗伯特·林奇特^④ (Robert Lichter)、琳达·林奇特^⑤ (Linda Lichter) 和斯坦利·罗思曼^⑥ (Stanley Rothman) 进行的调查显示，在权威的全国性新闻机构工作的新闻工作者中，54% 的人认为自己是自由派，17% 的人认为自己是保守派，其余的则认为自己属于“中派”。虽然这并不能证明作者所认为的全国新闻工作者都是“无差别的”自由派观点是正确的，调查采用的方法也受到尖锐质疑，但它还是支持了许多观察者更为偶然的观察。¹¹

[7]从整体上来说，美国新闻工作者的政治观点，同华盛顿和纽约的新闻精英相比，大体上更接近于美国人民。¹²但是，林奇特夫妇与罗思曼发现，即便是在全国性新闻工作者当中，也存在着非常微弱的自由派色彩。新闻工作者在社会问题上表现为自由派（53% 的记者认为通奸没有错误），而在经济问题上他们则会

① 理查德·尼克松 (1913 - 1994)，美国第 36 任副总统 (1953—1961) 与第 37 任总统 (1969 - 1974)，美国史上唯一一位同时当过两届副总统与两届总统的人，也是唯一一位于在位期间，以辞职的方式离开总统职位的美国总统，1969 年当选美国总统，1974 年因为水门事件而辞职。

② 帕特里克·布坎南 (1938 -)，美国专栏作家，电视节目策划人，曾任尼克松、福特、里根三届共和党总统的高级顾问。现为时事分析家，《麦克劳克林小组》节目的常客。

③ 斯皮罗·阿格纽 (1918 - 1996)，美国政要，曾任马里兰州州长和尼克松的副总统 (1969 - 1973)，1973 年因逃税而辞职。

④ 罗伯特·林奇特 (1948 -)，美国传播社会学家，媒体和公共事务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新闻和娱乐媒介的科学研究。

⑤ 琳达·林奇特 (1956 - 2009)，美国传播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奇特之妻，著有《媒介精英》。

⑥ 斯坦利·罗思曼 (1927 - 2011)，美国传播社会学家，史密斯学院荣誉教授，曾任该学院的社会和政治变迁研究中心主任。

采取“普通的”^① (plain vanilla) 观点 (只有 13% 的人认为政府应该拥有大公司)。虽然新闻工作者中的勉强多数 (54%) 希望资本主义以富有同情心的面孔出现,但是他们都宣称自己是自由派,换句话说,他们完全接受资本主义框架。

此外,右派批评者从未对新闻工作者是否有效地把职业规范视为高于个人观点这个问题表示满意。虽然被调查的全国性新闻工作者中的大多数可能倾向于自由派,但是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他们并不是高度政治的或政治化的。新闻工作者认为,他们自己是专业人士而非党徒。他们是为维护职业原则而非满足自己的政治热情而工作的。¹³

右派批评者们还成功地引起了那些拥有新闻以及写作新闻的人的注意。这确实很重要,如果它不是总是处在右派批评者所认为的方向上的话。的确,新闻工作者不断丰富个人境遇比他们公开宣称的政治观点更可能影响全国的记者。在这种情况下,左派批评者比右派批评者有更多抱怨的理由。新闻工作者威廉·格雷德^② (William Greider) 悲叹,工人阶级的记者已经被“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代替了。¹⁴《华盛顿邮报》的霍华德·库尔茨^③ (Howard Kurtz) 描写了那些开车从郊区赶来并“依靠电话和传真”采访的记者的孤立无缘。这些记者怎么报道市中心的贫困与其他问题呢?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这些报纸只反映白人中产阶级社会的情绪与价值观。而在 1990 年代早期之前,中产阶级社会就已经对难以处理的城市中下阶层问题产生了厌烦。¹⁵

但是,这不仅仅只是厌倦或疲惫的问题。与其他人一样,当问题与话题关乎同自己相似的人时,新闻工作者更容易认识到并更热切地追踪它们。而当它们涉及的只是自己社交圈以外的“其他人”时,新闻工作者就不会如此了。两个例子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当 1992 年“佐伊·贝尔德问题” (Zoe Baird problem) ——克林顿总统任命佐伊·贝尔德为司法部长而引起争议时,新闻媒体的报道一致采取了避免被关注的方式。佐伊·贝尔德与她的丈夫雇佣了两个人在家照顾他们的孩子。与多数这种情况下的美国人一样,他们没有按法律规定为这两名雇员支付

① 金融市场的专用术语,常用代表最单纯形式的金融商品。在选择权市场中,对于最“原型”、最“基本”的选择权契约,称为 Plain Vanilla 型的选择权。相对的,其他具有复杂条款的选择权契约,就被称为“新奇选择权” (Exotic Options)。

② 威廉·格雷德, (1936 -), 美国新闻工作者、作家,曾任《华盛顿邮报》记者和主编,现为《民族》 (Nation) 杂志的驻外记者。

③ 霍华德·库尔茨 (1953 -), 美国新闻工作者、作家,《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 CNN 电视台《可靠消息来源》节目的主持人和美国各大报刊的著名撰稿人,被《美国新闻学评论》评为全美最优秀的新闻记者,著有《克林顿宣传机器内幕》等书。

社会保险税。这引发了有关佐伊·贝尔德可否担任这一地区首席法律执行官员的争议。按照佐伊·贝尔德及其境况相似的其他人的观点，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在调查这个事件所引起的法律、道德与政治问题。

[8]但是从家庭雇工的观点来看，法律和道德意味着什么？很少有提及，更不用说细致的分析了。西班牙语电视网“联视”^①（Univision）是一个例外。它剖析了家庭雇员，并从过低报酬、过度工作的移民照看提供者的观点出发，对儿童看护进行了扩充报道。联视新闻工作者不仅仍然认同了辛勤工作的专业人士佐伊·贝尔德，而且还认同她所雇佣的拉丁美洲的家庭工人。¹⁶这些记者与其他记者，同样遵守职业规范，在相同的学校受过教育，并分享相同的更广阔的新闻文化。但是，形成主流新闻界共识的是作为整体的美国社会广泛的阶级与种族偏见，以及主流媒体理所当然的视角，而不是新闻常规与所有制形式。

或者可以用已故兰迪·希尔茨^②（Randy Shilts）的评论作为例证。他是一名作家与《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专职报道艾滋病的记者。1987年他关于艾滋病的书——《乐队继续演奏》（*And the Band Played On*）出版。当时，希尔茨在采访中说道：“任何一名优秀记者都应该做这个报道，但我想之所以只有我报道了而其他没有报道的原因是我自己就是一名同性恋者。艾滋病发生在我关心的与爱的人身上。”¹⁷希尔茨的话简单而浅显，但在大多数的新闻学分析中却常常被忽略。当然，在相同的情况下，一名女记者比男记者更可能把强奸看成是有新闻价值的问题。

幸运的是，同情是人类力所能及的事。好的新闻事业经常是唤起同情的手段。但是谁撰写报道是个问题。当少数族裔，女性及那些直接面对贫困与厄运的人成为了报道撰稿人，就像他们作为读者一样，新闻中所表现的世界将会扩展与改变。

左派与右派的批评在同一个主题上各有说法——媒体有政治偏向。另一种观点是，媒体不是在政治上而是在职业上被设定了偏向。关于政治偏向的批评认为新闻工作者应该是说出事实的专业人士。而对于其他批评者来说，专业主义是新闻事业的弊病而并非良方。

[9]无论专业主义是问题的一部分还是解决方法的一部分，它都是当代美

① 美国最大的西班牙语电视网。

② 兰迪·希尔茨（1952—1994），美国记者，美国第一位专职报道艾滋病的记者。他是同性恋者，1987年出版《乐队继续演奏》，后成为畅销书，死于艾滋病。

国新闻界的一个特点。从历史角度看，新闻学没有什么比 19 世纪的政党报纸向 20 世纪商业化的专业报纸转变更重要的事情了。¹⁸拿任何一张 1995 年主要大城市的报纸与 1985 年的报纸作比较，立即就可以证明今天的新闻更多地被专业的光环笼罩，它比一个纯粹的政治新闻界更少受到政党期望或忧虑的影响。以前，记者要按照发行人制定的编辑方针步调一致地前进，而现在，记者就自由多了。

分析专业主义反政治、反党派的观点对理解当代新闻界十分重要。但是从新闻界是“专业的”角度来看，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从 1970 年代初起，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通常以对新闻编辑部实践的民族志观察为基础。研究显示媒体偏向是来自于组织惯例与压力约束下的专业成就，而不是来自意识形态的故意曲解。对于这些研究者而言，新闻组织与新闻常规产生了偏向，它一方面与媒体所有制无关，另一方面也与记者个人的观点无关。在这个观点中，对于客观性的寻求本身就是偏向产生的源泉。¹⁹

四种类型的偏向是经常被引用到的：新闻被说成是特别负面的、超然的、技术的、官方的。首先，新闻趋向于坏消息。迈克尔·鲁宾逊（Michael Robinson）和玛格丽特·希恩（Margaret Sheehan）发现，在大多数时候，报道 1980 年总统竞选的电视新闻对于候选人的评价是中立的或模棱两可的。但是，五个报道中有一个可以被判断为“正面的”或“负面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 70% 的时候是负面的 [而合众国际社（UPI）等通讯社更为平衡]。²⁰1992 年，关于三名主要总统竞争者的报道被证实无论如何都是负面多于正面的。这并不是因为记者是“敌对的”或无政府主义的，而是因为他们专业的。²¹新闻倾向于强调冲突、纠纷与战争。根据新闻惯例，每个故事都有两个方面，但是即便在认同相对一致的例子中，新闻也强调冲突的出现。记者越来越试图去“看穿”（see through）而非观察政治。虽然这样可以使记者免受被报道政客的欺骗，但是却把政治领袖剖析成他们最坏的形象，除了政治利益没有其他任何动机。

[10]第二，新闻倾向于超然。对于政治生活，新闻工作者越来越采取一种疏离甚至是讽刺的态度。事实上，他们的专业主义原则与编辑部中愤世嫉俗的文化强迫着他们这样做。很明显，这并不适用于体育报道、人情味特稿与调查性报道。体育报道认为党派偏见理所当然，人情味特写依赖于记者与读者内心的人类同情心，调查性报道则靠的是主张道德义愤的能力。但是，例如在选战新闻中，超然教会读者冷静与专业地识破政策声明以及政治交易中辞藻华丽的诉求手段。

选举新闻的“隐含的读者”^①（implied readers）是政治超市中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有时间、兴趣与注意力去货比三家，阅读每个包装上的成分表，核对商店的单位定价信息，把广告作为信息来关注，但又能把它视为宣传而不予采纳。不久，这种理想的政治消费者将会形成对一个候选人或另一个候选人的合理的理性偏爱。问题在于他或她没有通过投票把这种偏爱转化为实际选票的任何动机。阅读了现代竞选是“所有家庭的一场灾难”的报道后，谨慎的新闻读者与观众可能被彻底地说服呆在家中。

这涉及美国新闻事业的第三个倾向：重视战略与战术，重视政治技巧而非政策结果，重视机械的技巧而非意识形态的技巧。强调技巧可以使新闻工作者变得专业，因为这样他或她就能保持远离“利益、观点与价值冲突这些政治生活中最危险的东西。”^②做政治类报道的记者愿意做沉迷于政治，而不是政策。他们宁可全神贯注于“战略与技术”的分析（“inside baseball” analysis），也不愿意被政府如何管理国家这个问题弄得神魂颠倒。

如果你从当代政治文化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开始，那么自然会得出新闻是负面、超然与战略性的结论。以罗纳德·里根^③（Ronald Reagan）总统在结束休假、从加州返回华盛顿途中，在洪水肆虐的路易斯安那州停留为例。在那里，他在一个被淹没的小镇做了一个简短的广播讲话，鼓励当地居民并许诺联邦政府的救援。一张附着《纽约时报》报道的美联社（AP）照片展现了总统正在用铁铲帮忙填装沙包。《洛杉矶时报》^④（Los Angeles Times）以“里根全心投入地帮助洪水受灾者”的大标题报道了这条新闻。《纽约时报》如实报道了这个新闻，而《洛杉矶时报》却在第六段提到这只不过是“里根的顾问们一直希望到来的那类事”。这是一个“用表达对受灾人们关心的非常上镜的表情”来展现总统的好机会，这个事件在“白宫战略家们认为的合适的时间”发生了，把注意力从总统“在棕榈泉^④（Palm Springs）与富有的朋友度假”上移开。这个报道甚至提到，35名电话

① 接受美学术语。由德国接受美学创始人之一沃尔夫岗·伊塞尔提出。伊塞尔认为，存在着对文学作品的种种互不相同而又各有一定道理的解释，这是由于作品文本本身就具有产生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他用“隐含的读者”这个术语表示这一概念。隐含的读者植根于文本的结构中，它是隐形的，有待于实现。阅读的过程就是“隐含的读者”具体显现的过程。

② 罗纳德·里根（1911-2004），美国政治家，第40任总统（1981-1989）。在踏入政坛前，里根也曾担任过运动广播员、救生员、报社专栏作家、电影演员和励志讲师，他的演说风格高明而极具说服力，被媒体誉为“伟大的沟通者”。

③ 创刊于1882年，美国西部第一大报。目前陷入经济困境，其母公司论坛报公司处在破产保护状态。

④ 美国佛罗里达州度假胜地。

公司的工人为了安装总统的广播设施而离开了救灾岗位。而《纽约时报》唯一的批评分析的暗示是在第十一段中提到的：“当时，里根先生一直在等待一队摄影师穿过被淹地区来到广播电台，这样摄影师就可以摄录他乘坐吉普车到来的情景。”²³

[11]是《纽约时报》疏忽了而未能像《洛杉矶时报》那样为读者提供新闻的战略与政治环境吗？还是《洛杉矶时报》过于愤世嫉俗了？这是这位娱乐界的总统在真诚帮助社会的同时也帮助自己的例子吗？1983年，总统正在疲软的经济形势下为大选而努力。我们能像《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所说的那样确信，广播是以真诚地慰问为目的而迫使工人离开岗位？或许事实如此，但是为了当地的民心，这样的牺牲值得吗？或许《洛杉矶时报》做得过火了，但却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出它的报道之所以比《纽约时报》更加高明的理由。²⁴

这两篇报道都表明了新闻的第四个倾向：它是官方的，依赖于正统的公共消息来源。这种消息来源往往是身居要位的政府官员与数量相对较少的可信赖的专家。新闻是新闻工作者的也是消息来源的产品。事实上，大多数分析者认为后者占了上风。²⁵这与专业主义导致负面新闻的评论矛盾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占据大多数时候大多数报纸的从官方消息来源获得的常规新闻与突发新闻之间，我们是可以辨别的。后一种新闻中，意外事件、丑闻、（来自其他官员的）泄露或者新闻工作者讽刺性的保留态度，质疑和破坏了官方的通告。即便新闻常常使官员卷入负面报道，但是他们仍然是新闻和消息来源的主体。²⁶

[12]负面的、超然的、技术的与官方的——依照这个观点，新闻界的问题正是专业主义而不是缺少专业主义。专业主义制造了它独有的视角。在关于政府的报道中，这种视角创作出的新闻产品可能有助于如下观点：公民强化政治是一场引人注目的体育比赛。

在理解新闻时聚焦于媒介专业主义，会招致像新闻工作者一样去审视新闻事业的危险。虽然他们对真相的孜孜以求，仅仅由于竞争压力、截稿时间、守旧的老板以及对官方规则的效忠而有所减弱，但是新闻工作者仍然把他们自己描述为努力工作、见多识广的专业人士，并为其作为整体的专业人士而感到愉悦。这表现了他们自己的主观经验，但是也把新闻事业误解为一个整体。新闻事业并不是记者与主编个人主观经验的总和，而是产生记者个人主观经验的来源或结构。

这个观点需要加以阐释。新闻工作者的自我理解还不够。例如这句话：“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报道，是因为发行人或主编或制片人关心盈亏结算底线（bottom